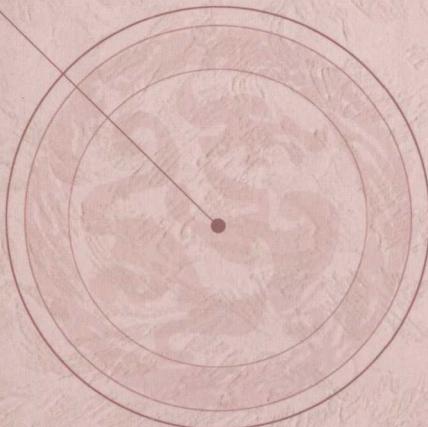


清末民初 汉译法国文学研究

(1897—1916)

韩一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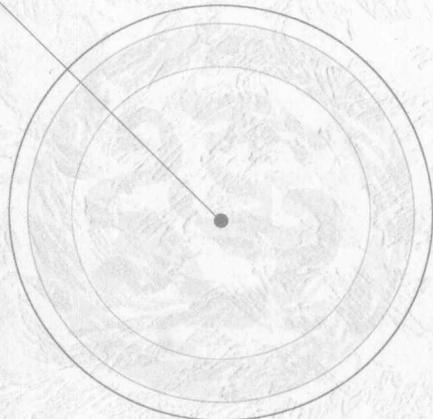
韩一宇 著

清末民初

汉译法国文学研究



(1897—191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 / 韩一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04-7002-1

I. 清… II. 韩… III. 法语－文学－翻译－研究－
中国－1897～1916 IV. I046 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849 号

责任编辑 薛 波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福瑞来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 张 怡 贺善侃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梅芳	张 怡	贺善侃	吴志刚
杨小明	廖大伟	黃德良	邵 腾
章礼强			

則相見，思慮難辨，雖非直學大學派，來則升平也。是其自述，抑固猶如矣。重，製其頭髮，學尊赫然，誠為至良，甚者則竟與樹林學達參文，皆可觀也。王氏工均茶一丁，其餘氏

总序

以研神妙的刻學文人學派，承前啟後，不遺遺大遺小，而得其真髓，原式離內靈脈，對藝術學說深，長短一掌式，真式以研學持之，文人傳承承，平本降學文人學宗高貴衣裳，皆

好几年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们就筹划着把大家的学术成果汇编成一个系列，出版一套《东华人文学术文库》，以及时反映大家的学术成果。经过若干年的准备，《文库》第一辑《论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中西科技文化比较》、《明清科技史料丛考》、《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近代中国金融业的转型与成长》、《文化市场发展战略研究》等6本专著终于将与读者见面了。这6本学术专著的陆续出版，标志着展现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东华人文学术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推出。这套丛书将同步记录着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并随着东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拓展下去。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是《文库》出版的宗旨所在。《文库》将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目标，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学术观点、理论体系的创新为任务，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东华大学学科建设，为高校文科教育发挥思想库作用。

东华大学是以工科见长的全国重点大学。根据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华大学直面挑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保持特色学科发展优势、重点突破的同时，努力创建了一条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道路。

在此大背景下，近 20 多年，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们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聚焦学科建设，加强内涵发展，赶超学科前沿，努力提高东华人文学科水平，使东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长足进展。

现在，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东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水平已有相当雄厚的基础。近年内，本学科教师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理论前沿》、《学术月刊》、《现代法学》、《史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专著数十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史、行政管理等学科领域形成一批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承担过“虚拟认识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资本的历史极限与社会主义”、“政府管制法基本问题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获得过多项省部级科研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优秀教材等教学奖。目前已形成虚拟哲学与科学认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科技文化与技术思想史研究等研究方向。其中，“虚拟认识论”、“发展哲学”、“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城市形象研究”、“民主政治视野下的非营利组织与经济发展研究”等专题研究均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来曾主持“大都市形象国际论坛”和“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等重大学术活动。

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把握时代脉搏，对重大现实问题

及时做出深切思考，以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问题作为学科前沿所要回答的问题。近年来，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在辛勤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的同时，努力抓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一批批研究成果。《文库》推出的第一辑学术专著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些专著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学科前沿问题，专著的作者都是这些领域享有一定声誉的教授。这些专著凝聚着他们多年研究的心血，反映着他们最新研究心得，是东华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

《文库》出版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东华人文学人的学术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展现这些有形文字背后的无形的学术精神，诸如：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勤于耕耘的踏实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永不知足的进取精神等。这些精神，将伴随着《文库》的不断延续而延伸、发扬光大。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宽广，内容博大精深，研究课题永无止境，因而《文库》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宏大的研究平台。《文库》的推出，并不祈求在短时间内去穷尽这浩瀚的研究领域，而只是期望创造一个持续不断、坚持不懈的研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文库》的出版受到东华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在此谨向一切为《文库》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领导和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东华人文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8年元月于东华大学

音沮沉鬱，猶蟲声應時而生滅。世天令妙而，懷愁苦更甘。

——劉詩同，歲暮同輩共飲味人生而笑。04年一个大一丁榜君，學文因代選體，那掛頭華文國者可謂工劍新歌。豫，吾考京一丁舉告矣，不取而歸基於臺廈，今則仍避世圃出土耕丁冊主體，學大就京東留讀研學各官。丁武出自鄉城裏奇跡文因代選舞手冬音資出，奇櫻蘭育耕人固中春脫。（A30）謝資，好之將谷工長賦，細雨如絲，高歌空歌，自爭青，墨綠西學舞西山而去出版參寫，吾國回憶。謝資土耕節學文勞出丁耕我曉。韩一字打來電話，告知她的博士論文就要正式出版了。我于是想起寫序的承諾，趕緊將她的論文找了出来，只見封面上清晰地打印着“2004年5月”。即是說，從她答辯至今，不經意間，四年過去了！腦子里一下子飛進出“光陰似箭”，“彈指一揮間”，“逝者如斯夫”……諸如此類的感慨。

且在對時間飛逝如水似箭的感慨中，不禁想起一字來考博時的情景：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面試考場，走進一位中年婦女模樣的考生。瘦弱，腼腆，一襲簡裝，一臉倦容。登記表上的出生日期顯示她已年近40，於是考官們互視，目光中似可讀出：這個年齡還來讀博？

或许是“同病相怜”？抑或“感同身受”？恰恰是因為這個年齡，我才對她產生了極大的好感。我自己是1984年出國讀博的。抵巴黎后的第二天，我獨自一人度過了40歲生日。但對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來說，出國留學，就是圓夢，就是對逝去韶華的最好補償。莫說年齡，任何困難都不在話下。那時的人都是單純而勇敢的，頗有些“氣吞山河”、“舍我其誰”的勁頭，傻且痴。正是憑着這樣一股勁頭，在此後四年的时间里，我完成了從修博士課程到獲得博士資格，再到撰寫、答辯論文的全過程。當然，四年走得不容易，個中冷暖，唯己自知。

但万没想到，面对今天世上如此多的诱惑与选择，居然还有一个40岁的女人和我当年同样痴、同样傻。

她诉说了她与法国文学的渊源：她教外国文学，得到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突击学了一点法语，就很奋勇地独自出发了。在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大学，她注册了博士资格（DEA）。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奋，也凭着多年教授外国文学的积累，两年后，她在提高了法语的同时，通过了各种考核，获得了比较文学的博士资格。她回国后，仍在送她出去的山西教育学院（可见那时的人仍然是讲“信”的）工作，但她一天都不曾放弃过要继续学业的梦想……

接下来的岁月对一宇而言，我想只能用那个已经变得很俗很老套的话来形容：“痛，并快乐着”。倘若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认真问学者，那么，40岁才踏入北大课堂的一宇所经历的，为人妻、为人母的一宇所忍受的，不仅数倍于常人，且难为外人道也。而那“痛，并快乐着”的岁月留给一宇，也留给我们的，就是这部颇见功力的《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

法国文学自近代以来一直在中国翻译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也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人们多以“个案”或“通史”的方式去处理，前者对研究对象能有较深入的把握，后者则以“一览众山小”的气度见长。而本书却未按此常理选题，作者小心翼翼地切了20年，截取了“清末民初”（1897—1916）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希望从源头开始，认真梳理早期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并进而探讨由翻译展现出来的那个时代中西文化对话的诸多问题。这样的选题不仅以断代研究的形式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而且因其所选时间段的特殊性而成为该方向上最具难度和挑战性的课

题之一。“译文”莫趣去，“云敝皮识蠹食”皇帝虽而“史学文曲出”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孕育着巨变的转型期。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各种主义转瞬即逝。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时期，作者却能通过对庞杂繁芜的文本、史料、档案的细致爬梳、考辨，将大量原本处于朦胧状态，甚或不为人知晓的译本、改写本、译者的情况一一清楚地呈现出来。记得就连夏晓虹教授这样的晚清专家都在答辩时赞赏作者在资料方面投入的巨大精力与考辨的精详，认为“这在近代文献总体上汗漫无际与微观上严重匮乏并存的状况下，尤显难能可贵”。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作者使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译者，使一些一直淹没在历史烟云中的译本，终于清晰地浮现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进入了他（它）们本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种文学史、文化史关怀，其实贯穿了全书始终。在作者精详考辩的背后，是对“清末民初的汉译法国文学凝聚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积蕴”的清醒意识，是对考察与认识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化的血脉联系的强烈诉求。因此，作者才能从林译良莠不齐的现象出发，想到去考察林纾的合译者，钩稽他的交游网络；并由此牵连出晚清海军的历史，特别是福州船政局与林译的关系；再进而讨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景中，器物如何转换为精神，新与旧如何杂芜并存且相互作用。同理，她又从胡适对朱树人与林纾的相提并论切入，跟踪梳理《稽者传》与梅溪学堂及南洋公学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考辨出“无名”译者朱树人的曾经有名，详论他的出现正是“五口通商以后人文荟萃之地上海，以及在那里酝酿的中国近代之教育发展”的产物。作者汲汲于考察翻译背后“牵连着的丰富与复杂的文化因缘”，便使上述一类的例子在文中不胜枚举。由此而呈现出的是一张更为丰满，更为清晰，也更为生动的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地图。然而，作者的文化史关怀，其终极目的并不仅仅在从翻译、接受的角度重写这 20 年

的文学史，而是希望“穿透历史烟云”，去触摸“文化交流的鲜活本质”。这样的努力，彰显出作者的比较文学身份，因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作者对20世纪诸多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尽管全书很少拉出理论的架势，也鲜见引经据典地援引名家名作，但作者对现象的质疑，对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无不得益于她对当代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年鉴学派对网络结构、无名者、总体史的重视，文化转型后的翻译研究对译本生产过程，对在这个过程中操纵因素的关注，甚至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都在书中不同程度地启发、支撑着作者的研究实践。

“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它要求作者不仅要熟悉法国语言文学，还要对那个时期在中西间充当了文化中介的日本语言文化有较到位的了解。论及此点，我们就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由于作者不通日文，本书在相关论述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不甚了了。除此之外，大量杂芜存在的资料尚未穷尽；而对现象的讨论，特别是对“译述”问题所做的分析亦显仓促……不过，对于在40岁上敢于挑战自我的一宇而言，这些都应该不在话下。假以时日，相信她完全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奉献给我们更好的成果。一宇，加油！

末了，还要说的是：其实，本书早已纳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的出版计划，韩一宇也已于2008年3月正式交稿。但种种原因，终于使她没能等到那一天。好在书稿终究要面世了，我祝贺一宇，也庆幸自己在那个春天做了一个多么美好而睿智的决定，无论是作为导师，还是作为女人。

史丹利·布雷德利，美国作家，生于1920年，逝世于1983年，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闻名于世，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80)	“爱丽丝梦游仙境”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一
(28)	雨果《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	二
	国中之《羊三才式》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三
(19)	“好望角”	
(204)	受魏玛古典主义影响的《名媛》与《浮城子》	二
(801)	拿破仑早年“狂飙突进”诗派“狂飙”	一
(311)	拿破仑早年《狂飙》与《名媛》	二
引言		(1)
(15)	译者告解 章三集	
第一章 清末民初法国文学翻译概况		(9)
(第一节) 1897—1911年对法国文学的翻译		(10)
(181) 一 1897—1901年：起步阶段		(11)
(191) 二 1902—1911年：发展阶段		(15)
(第二节) 1912—1916年对法国文学的翻译		(23)
(201) 一 译入作家		(24)
(202) 二 出版者—译者—读者		(30)
(203) 三 译本的语言		(34)
(第三节) 影响本时期翻译的几个因素		(37)
(281) 一 期刊导向与社会文化潮流		(38)
(291) 二 题材中心的本土选择		(41)
(292) 三 本时期的日文转译		(50)
四 旅行者带来的接受效应		
(311) ——以清末最早译入的两剧本为例		(56)
(312) ——从《茶花女》到《红与黑》		
第二章 法国文学的中国阅读：作家作品翻译接受		(一)
(621) 个案		(67)
(622) 第一节 “法国大文豪儒俄”：维克多·雨果的早期		
(623) 翻译		(68)

一 雨果作品早期翻译概览	(68)
二 雨果作品的早期接受取向	(82)
三 雨果作品接受个案：《九十三年》之中国 阅读	(91)
第二节 都德《最后一课》的早期翻译与接受	(105)
一 “首译”考辨：“陈匪石译”与胡适译	(106)
二 《最后一课》的早期接受	(113)
 第三章 译者研究	(121)
第一节 本时期译者概况	(121)
一 译者总体情况	(121)
二 译者的文化准备	(129)
三 清末民初译者的“代”与“群”	(141)
第二节 林纾与法文合作者	(146)
一 从王寿昌看翻译家林纾的地缘与人情	(147)
二 林纾与王庆骥——被遗忘的法文合作者	(162)
三 作为文化现象的林纾与林译	(178)
第三节 朱树人：“无名”译者的世界	(180)
一 《稽者传》的流播	(182)
二 译者朱树人、他的翻译活动及其他	(194)
三 对“无名”译者的思考	(212)
 第四章 “译述”时代：翻译“策略”与文本现实	(217)
第一节 “译”与“作”杂糅之特例二种	(217)
一 《惨世界》：“借体寄生”式的译作杂糅	(218)
二 《孤儿记》：“移花接木”式的译作杂糅	(236)
第二节 “译述”的时代选择	(246)
一 “译述”主“达”	(248)

二 从“译述”到“直译”	(267)
结语	(276)
 主要参考文献	(281)
 附录一 汉译法国文学作品年表 (1897—1918) (待修补)	(298)
附录二 1897—1918 年译入法国作家一览表	(342)
附录三 1897—1918 年译入作品列前十位的法国 作家译本简表 (按姓氏音序排列)	(350)
附录四 译本《鸣不平》略考	(371)

引言

提起法国文学，凡受过中等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大约都能列举数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都德的名字及其代表作。在书店和图书馆的外国文学类图书中，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和福楼拜、凡尔纳，以及新的、更新的一代代法国作家的作品也总是持久地吸引着中国读者。显然，法国文学在现代中国自有其一席之地。而它的存在，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就体现为教材中接触的、书店和图书馆里看到的、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译本。所以，在汉语语境中，作为“外国文学”的法国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近代以来文学翻译的历史密不可分的。

自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真正关注西方文学以来，法国文学就始终是主要的翻译对象之一。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的统计，在1840年至1920年间，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在数量上紧随英语文学之后，占第二位^①。在接下来的时代，汉译法国文学也始终在外国文学翻译中名列前茅^②。正是通过绵延不断的翻译

^① [日]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该文统计数字系根据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7),收入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② 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紧随俄苏文学之后，仍列第二位。参阅孟华“中法文化交流”，见罗芳、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活动，法国文学在中国获得了生命的延续，成为中国人了解法国的窗口，不断丰富着中国人对法国的想象，也在各个层面上参与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实际上，以“外国文学”面目出现的翻译文学，是用接受者的语言表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以接受者的文化加以阐释的。因此，汉译法国文学如何以其独特的面貌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二

对于近代以来的翻译文学，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已多有涉及，现存研究成果基本可归纳在中国文学史与翻译文学史研究两大类中。

早期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都曾把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36），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等。阿英30年代开始写作的《晚清小说史》，把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描述，为后来的研究者展现了最为切近研究对象的时代氛围。比较晚近的著述，如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立场上处理1897—1916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史，特别重视以“译本”形式存在的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复杂纠葛。其前两章，尤其是第二章对晚清文学翻译的实绩与特点、本土接受中的误读等进行了论述。此外，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本土文学演变中域外因素的意义。在以上这些著述中，论者的着眼点集中于中国文学本身，翻译文学更多的只是作为参照系和刺激新的增长点的外来因素而加以观照。

同样是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切入，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

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在整理近代翻译文学遗产方面的成就。而且，施蛰存先生为此书所做的《导言》也对翻译文学研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收入《翻译文学集》三卷。这一设计，为以前所出《新文学大系》二编所未有。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考虑的是，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①我们注意到，这里的翻译作品，还是以“有密切关系”的参照记录出现在今人的近代文学框架中。事实上，它触及了翻译文学在研究视野中的边缘状态，而它引出的怀疑，也提供了值得追问的话题。论者对翻译作品“当然不是”中国近代文学的表述，事实上涉及的不单纯是“归属”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对其特殊性认识与把握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是”与“不是”之议，而在其他阶段，这一问题就不曾或不再如此突出？可见，这是近代文学独有的现象。所以，“当然不是”的断言似值得商榷，或者至少在“是与不是”之间要作许多界定。同时，“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也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翻译文学集》同时也为本课题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对话目标。

在翻译文学史研究方面，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翻译史著述、专题研究和史料整理几个方面。

在翻译文学史方面，笔者所见最早的工作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学生所作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②。

① 施蛰存：《翻译文学集·导言》，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以下简称《翻译文学集》），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7页。

② 北京大学西语系1960年铅印本，未正式出版。